

文化底蕴: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

丁德科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文化的内容主要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哲学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哲学的精湛思想和基本精神是文化底蕴之所在,包括中国哲学的天人观、知行观、义利观、辩证观等精湛思想和哲学的主要精神,也就是传统人文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底蕴得到新的更生,并且直接或简接地作用和影响于经济决策及经济决策的贯彻落实,充分显示出其现代价值,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资本。

关键词:文化底蕴;经济发展;人文资本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3)03-0046-05

哲学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1](P11),是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底蕴。哲学的精湛思想和基本精神是文化底蕴最为主要的内涵,即人文精神,是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中华民族深厚久远的文化底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断得到更生,日益显示出特有的现代价值。

一、文化、哲学和文化底蕴

关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据统计,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二百种”[2](P1)。给文化下定义何以如此难,难在哪里?难在“文化既是一种生活形式,也可以是一种知识形式,还可以是一种教育形式;既有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也有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还有物质、精神界限不清的如书籍、电影、戏剧、语言等形态的文化。由此我们发现文化定义之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问题理解不一,或把文化看成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或把文化看成是一种观念形态,或把文化等同于人类文明”[3](P33~34)。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述,正确而科学。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相对而言的文化,可以解释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艺术、道德、科

学、宗教、哲学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和法律思想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产生的,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理论的总和。法律思想是关于法的关系、规范和设施的观点、理论的总和。政治和法律思想是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是意识形态诸形式的核心。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科学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和普遍定理的运用,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的知识。宗教是以超自然力量的形式对社会存在的幻想的反映。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能力和理论思维。

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首先,相互对立、相互区别。虽然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反映的内容、方式不同,与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情况不同,且各自起源有先后、发展前途各异。其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政治思想居于核心地位,决定整个上层建筑的性质,并强烈地影响着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哲学和科学因其以理论形式概括世界本

收稿日期:2002-12-28

作者简介:丁德科(1962-),男,陕西铜川人,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产业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产业经济学。

质和规律的特点,能够敏锐地反映社会变革的契机,往往成为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先导,但这种作用也要和政治思想相结合或转化为政治思想才能得以实现。艺术把其他意识形式作为内容,其他意识形式又可通过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哲学和科学、道德、艺术是不同的社会意识,有其独特的领域,但分别具有的真、善、美的本质,又彼此融为一体。

哲学在诸意识形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对整个世界作总的研究和说明,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为基础,又是统帅其他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式,而且是能够从世界观的高度反映社会存在并指导人们实践的科学。这一比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4](P249),通过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间接地反映和作用于社会存在,发挥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说到底,在文化范围内,哲学“是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1](P3)。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4](P121)。哲学的精湛思想与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的基本内涵,这便是文化底蕴之所在,也即人文精神。

二、哲学的精湛思想和基本精神 是文化底蕴的主要内涵

集中地反映文化底蕴的是哲学,而哲学的精湛思想、哲学的基本精神生动地体现为人文精神。属于哲学精湛思想的是:关于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天人观,即天人合一与天人相胜;关于认识和实践问题的知行观,即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关于人格价值的价值观,即“见利思义”与“以德服人”;关于思维方式的辩证观,即“叩其两端”与“穷神知化”。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生观,即“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胜”。“天”指自然界,“人”指人类及人类社会,“天人合一”与“天人相胜”是中国哲学关于“天”(自然)和“人”(人类及人类社会)关系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在孟子思想中,天、人虽不是同一概念,但近乎相同。荀子认识到天、人不同,天人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所以“能参”[5](《荀子·天论》)。孟子的“心性说”、荀子的“天人之分”论,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唐代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认为“天之

道”和“人之道”[6]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不仅承认天与人相统一,也承认“天道”与“人道”有区别。程颐强调“与物同体”,程颐强调“天道”、“人道”的同一性,要求人充分遵循客观规律。朱熹、王守仁、王夫之分别继承了程颐、程颢、张载的观点,但都认为天人有所分而统一。总的来说,中国哲学更多地强调了天人合一,并一定程度地探讨了“天人相胜”。

(二)“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知”就是知道、了解,进而指正确的看法和认识,以至理论观点;“行”就是行为、作为,也就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孔子、孟子、荀子都重视“知”,更重视“行”。孔子认为坚持正确的认识,并把正确的认识付诸实施而得到成功,是最高境界。孟子以“行天下之大道”为人生远大追求。荀子认为只有“行之”才能“明之”,“明之”就如同“圣人”一样伟大。宋明理学关于知行的认识上了新的台阶,一方面,认识到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认识到正确的思想理论是达到至高精神境界的标志。明代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其正确之处在于认识到知与行相互依存,其错误的看法是混淆知与行概念,其“知引合一”是“销知以归知”、“以知为行”[7]。王夫之明确提出“知行相资”的命题,对知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要说明的是,中国哲学的“行”主要讲道德履践,“知”主要讲道德认识。

(三)“见利思义”与“以德服人”。“义”指道德;“利”即利益,一切精神与物质的利益。在义和利面前,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是强调道德的“义”,视道德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置利益追求为服从地位。由此出发,孔子旗帜鲜明地主张“义以为上”,教育人们要“见利思义”。同时,也重视“利”,认为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8]。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有舍弃生命的希望而求取道德的圆满的观点。后世儒家对孔孟义利观不断有所阐发,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义利统一,强调义利兼重。这个“利”更多地指国家与民族利益。这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并汲取其合理成分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价值观的另一个问题是“德”与“力”的关系问题。“德”指道德教化;“力”指用政令和刑罚来规范、约束、治理,也即法治。崇德轻力的观点是主流,德力并重的观点居于次要地位。孔子崇德,认为“为政以德”,天下百姓自然归附。孟子主张“以德服人”,因而他有“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的治国之道。墨家墨子认为德力统一,法家韩非认为德力对立。墨家、法家观点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影

响,汉王充集前人观点之大成,对德、力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视德力并重为治国之道。

(四)“叩其两端”与“穷神知化”。“两端”指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中国自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的“道”论,首先揭示了事物从其产生起就是运行变易的,表明中国哲学从其开始便认为世界本原就是变易的;同时,揭示了事物对立转化规律,认为返本复初是对立转化的结果。儒家是重人事的“人学”认识论思想,孔子“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论领域,创造了‘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和而不同’逐渐成为先秦时期儒家处理文化问题的一种主张”[4](P349)。它也影响到其他学派和政治领域。《易传》进而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有对”和“变易”的道理,肯定天地自然直至人类社会,一切都是“有对”的,具体而微地阐述了天地万物怎样由阴、阳为基调的相互作用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进而认为品质崇高的圣人才有可能通晓事物变化的重要道理:“穷神知化,德之盛也。”[9](P581)告诫人们应顺应事物变化的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北宋邵雍,把“有对”称为“一分为二”[10]。北宋王安石不但承认世界的运动变化,而且肯定运动变化的特征是新与旧的更替,是新的更生和旧的灭亡的过程。张载对“有对”之学有“一物两体”[11]的观点,认为事物的“有对”决定事物的特性,也因为“有对”才有统一,在统一中包含着有对,一定程度地将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融合一体。王夫之得出事物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有对”的、“有对”是事物固有的、“动动也”、“静也动也”等结论[12],将“有对”的辩证思想与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易传·乾卦·象传》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9](P8)自然界永不停止地运行变化,君子应当效法自然,自立图强,刚健有为。道家认为自然的特征素朴,无私无欲,包容和谐,无为不争。儒家认为自然与人、人与人“普遍和谐”,“仁”、“诚”是自然和人的本质,反映出对物质运动的真实性和道德性的深刻认识。因而,古代思想家认为君子应该具有刚健的品质:无私无畏,自立图强。他们认为应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易传·坤卦·象传》里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9](P27)地广而阔,君子应当以宽厚之德兼容并包万物。“德”即是道德,早期儒家认为道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孔子提出一个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仁”,孟子有“浩然之气”、“正气”之说,还有“大丈夫的概念”。道德修养达到宽

广深厚的高度,才能有博大的胸襟,才能有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理想,才能博采众长、创新进取,才能百折不挠、奋发图强,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西周末年史伯对这种精神就有所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和同之辩”中。“和同之辩”在孔子这里概括为“和而不同”,即善于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深入思考,综合分析,汲取优长,得出正确结论,坚持真理,而不狭隘固执,也不盲从附和。

三、文化底蕴是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本

在经济发展中,我们通常是非常在乎和用心运用资本的,而对社会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文化因素,则缓几步、比较少的涉及和研究。实际上,资本是人创造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和积淀的文化因素使得资本增值和积累。文化及文化水平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资本理念,他们创造和积累资本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所拥有的资本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自然形形色色。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底蕴特别是其最主要内涵构成的人文精神就是人文资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特殊形态的资本,不妨称之为无形资产。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不同亚文化区域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运行质量不同,大的来说,最明显的是东西部差距逐渐拉大,人文精神的无形资产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有形资本存量和增量变化的重要力量,真可以用杠杆的原理来解释。

久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其现代价值,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人文资本。总结中国文化的现代轨迹,十分清晰的是:在新中国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经济发展进程促进下,中国文化于继承创新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人文力量,在建设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文化底蕴对经济发展的人文支持的主要表现是:

1. 在经济建设中,切实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走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这是中国文化底蕴“天人合一”与“天人相胜”内涵在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表现。只有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客观规律统一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事实也证明这

样做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在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并比较快地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不仅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愈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实际迫使我们进行改革。经过艰辛的探索,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基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所奠定的深厚基础,党的十六大又提出本世纪头 20 年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这一个个重大决策的出台和实施,一个个新目标的实现,都说明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同样的重要。在微观经济中的这种事实更是不胜枚举。

2. 努力把一切经济决策都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正确的经济决策必须切实抓好落实,并注意在工作中不断完善经济决策 这是中国文化底蕴“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内涵在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表现。这一点,我们党发展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在八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始终坚持。“在我党的一切工作实际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3](P854)譬如,西部经济发展速度逐步与中部特别是东部差距的拉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发西部、发展西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于是,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4]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时机成熟是指,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全国社会物质资料丰富,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已为大开发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国家的帮助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支持下,西部已有条件实施大开发。因此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重大决策,是基于深入调查研究而提出的。之后迅即在全社会

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潮、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取得明显成效都说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是正确科学的,决策的贯彻落实是切实有效的。

3. 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步由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封闭型思维向开放型思维、由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 这是中国文化底蕴“叩其两端”、“穷神知化”内涵在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表现。改革从总体上采用非对抗性的、渐进式的方法推进。改革的渐进性使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不确定和剧烈变化的状态,呈现出多变性的特征。改革同时又是社会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技术形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双重嬗变,这就决定了人们在计划经济、农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必须发生深刻变革。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思想变化的深刻性,引起人们的思想领域和境界由封闭、单调、浅显向开放、多元、深刻转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明显增强。人们在开放中学习了新东西,增强了信心,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提高了竞争能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使人们接触到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异文化,增多了选择信息和观念的机会。改革实践过程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一些疑虑和困惑,诱发了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思想观念。这使得人们思想境界的多元、深刻、复杂性表现明显。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们也逐渐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性、依赖性进一步减弱,自主、自立、自强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进一步强化。

4. 人们的价值取向由传统的“见利思义”向合法合理的趋利性和务实性转变,经济建设由崇德轻力向德治和法治相结合转变 这是中国文化“见利思义”、“以德服人”内涵在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表现。“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是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被忽视,“文革”期间则是一种禁欲主义式的“极左”的义利观。后者大大有悖于人性和人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们进行其他社会活动最基本的条件,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贯彻符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人民群众意愿和人权的利益原则,但受益与创造和实现效益密切相关,且使利益原则的作用愈加广泛化,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凸现,造成人们思想活动的趋利性和务实性。人们义利观的历史性转变,使得经济活动的规则

与经济管理措施发生相应的改变。无论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思想上都有了一个“法”的概念,前者依法做事、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后者依法行政、依法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法制和法治的重要作用日益重要和凸现,并且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成为必然。

5. 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涵在现代中国经济建设中突出的表现。改革就是“自强不息”,就是要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开放就是“厚德载物”,就是要以包容的精神,集人类之精华,不断创新。经济建设的进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我国由无所不统的计划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阶段,虽然还停留于传统体制,但是已初步认识到当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市场机制的进步性,已经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历史地看,这是有创新意义的重大步骤。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底,我们总结、汲取国内国际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稳步地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由局部试点进入全面推开。这一阶段,确认实行计划经济同发展商品经济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初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必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探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到1995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15](P7~11)。这一阶段,把对中国发展得失进行深刻战略反思的结果是,与世界发展融为一体,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1995年至目前,我国经济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了科学的认识,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最先进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我国已经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和转变。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 文化与哲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 [2] 冯天瑜, 杨华.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黄新亚. 中国文化史概论·长安文化[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5] 章诗同. 荀子译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6] 刘禹锡. 刘禹锡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7] 王夫之. 尚书引义: 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9]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0] 邵雍. 皇极经世: 观物外篇[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影印本, 1988.
- [11] 张载. 正蒙: 参两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12]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 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3]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14] 江泽民. 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 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N]. 人民日报, 1999-06-17(1).
- [15] 刘国光, 沈立人. 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徐怀东]

Cultural Essence: Humanistic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DING De-k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Social ideolog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s the ideological bas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ore thought and basic spirit of philosophy add up to cultural essence——traditional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opening and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ssence is being regenerated, thus exerting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s on economic deci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a word, cultural essence has great modern value, and is thus important humanistic cap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ess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istic capital